



再思中国西南区域历史与社会研究的视角与范式

——首届“文本与田野：中国西南区域历史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钟荣帆

2024 年 1 月 5 日,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省社科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团队、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首届“文本与田野：中国西南区域历史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成都隆重召开,来自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西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 关于全球眼光、跨国视野、地方视域中的西南西北研究

如何重新思考西南研究的范式,是推动中国西南研究纵深发展的关键问题。四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文化产业管理系彭文斌《再思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回顾了西南研究的三种话语模式:一是华夏中原话语,自汉代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到清代《皇清职贡图》、《黔苗图册》,是华夏与边缘的帝制时代话语,特点是朝贡体系与早期民族志的确立;二是西方话语,以族群边疆理论为特色,自元代《马可波罗行纪》到 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时期趋于衰落,到 1980 年代末西方话语再次进入中国;三是本土话语,以文本性为特点,在民国兴起。此三种话语模式分别对应观察西南的三重视野,即华夏、西方、西南本土。面对社会场景和知识场景更替的大背景,中西方的西南研究范式有所不同,中国的西南研究模式主要是族群模式、区域模式及跨境模式,西方则是通商口岸范式、内亚(长城)范式、区域集镇范式,基于此,未来西南研究应在社会史范式(现代化)、物质文化史范式、族群交融范式(社会复合)、学术史范式四个维度持续推进。

从全球眼光来看,西南是通往世界的接口。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崔忠洲《道地药材：中国西南的世界网络》,立足全球视角,以原产南亚的药材辣木籽为例,指出在“道地”药材供需紧张的情况下,中国西南的传统“道地”药材产地,通过药材种植,成为“道地”药材的替代产地,以至于成为该药材新的“道地”产地。由此认为,“道地”作为一个概念,与实物药材一样,具有抽象的意义,并不必然具有纯然的“真实性”。在全球化浪潮下,流通具有突然中止以及其本质具有再重构的可能性。同时,在世界药材认知网络中,“道地”药材不仅将中国西南与世界联结在一起,而且构建了更为复杂的世界知识图景。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向玉成《近代入康外国人笔下的康区印象及其影响——以“香格里拉现象”为中心》一文,指出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香格里拉”这一名称已在入康外国人中使用,尤其以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为代表,这使得香格里拉现象风靡全球,而康藏地区的全球影响力也经由香格里拉现象而获得很大程度的提高。

在西南边境的人群也是跨界流动的。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思想战线》编辑部邓玉函《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互惠：以中越边境猛洞瑶寨为例》一文,从跨界人类学理论出发,探析了中越边境茶叶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的表现形式、组织架构,认为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强化了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跨界的文化共享是生态文化理念的共享,跨界流动强化了传统的瑶族茶俗文化,共享的跨界市场文

作者简介：钟荣帆,男,江西会昌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E-mail: zhongrongfan@163.com。

规则,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相通”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文本,抑或田野,西南皆具有作为区域与方法的意义。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杨正文通过个人在西南田野的游走经历,总结出文献文本与田野观察中的看、文相互印证,对于认识、理解类似中国这样具有历史深度的国家和社会十分有效。同时,对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或已经疏离传统文化的学人而言,回归传统,进行传统文化的补课,更显得必要。因此,在“第二个结合”的倡导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人类学、民族学课程体系之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志明《陕南在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的战略地位——基于革命地理学的视角》一文,以陕南在川陕苏区的发展规划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问题为导向,探究了陕南地区在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的政治功能定位,发现近代以热兵器为主要手段的战争,重塑了对山川地域形势的要求。陕南这一传统战争年代武装割据的“宠儿”,在近代战争模式下最终成为根据地建设的“弃儿”的变化过程,表面上看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缘因素发挥作用的差别,实质上是战争模式调整对于地域山川形势要求的全新塑造。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鹏辉《西康、新疆与台湾:李思纯学行所见之边疆时局》,以李思纯《康行日记》《金陵日记》为主体,探究了李思纯对西康风土民情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其对新疆和台湾地方局势的关注,由此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时代的强音,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也在边疆深入人心,铸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传统的“屏藩中原”认识依然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不可避免地忽视边疆社会的主体性。李思纯的边疆关怀,既有进化史观的历史纵深,又意图借鉴西方政治再造中华文明。

同样地,作为边疆的西北,也是思考西南研究的重要参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凌兴珍《“愚民”抑或“开智”“养蒙以正”“养民在学校”: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的教育思想辨析》一文指出,出生于云南蒙自、清末历宦甘新、民初主政新疆的杨增新,他不仅是一位“庭训而成,学优而仕”的科举正途出身官员,而且在仕宦甘新时期亦可谓“仕学相资”;他不仅在公余之暇“日日读书”“日日见客”以增广学识见闻,而且在教育思想上承袭了先秦诸子以及宋元明清儒释道各派“蒙以养正”、“学而时习”、“学不厌”、“教不诲”等主张,明确反对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愚民”思想,提出了“开智”、“养蒙以正”、“养民在学校”、“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等教育思想与行政主张;他不仅在清末为官甘新时致力于兴书院、办学堂、教官教将的教育实践,而且在民初主政新疆时亦因时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动新疆普通教育的恢复与发展、高等教育的奠基、职业与专门教育的创办,对私立教育较大规模的扩张亦有促进作用,从而为民初新疆社会持续十七年的和平稳定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上的基础与教育文化政策上的保障。

二 关于明清西南宗教文化与地方社会的研究

在传统帝制时期,西南虽处于“华夏边缘”地位,但并非帝国治理的终点。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马磊《官学之辅:明代海南书院与“大一统”塑造研究》一文,探讨了明代海南书院的教学宗旨、学制及时空分布,认为海南书院在承担读书人的人文理想、社会责任与国家教育责任之外,作为边疆“大一统”进程的重要一环和文化表征,在明中后期海南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政治意蕴更为突出。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松蔚《方外之外——清末庙产兴学的地方逻辑》一文,利用清代巴县档案,认为清末新政前,以庙建学已是各场镇的普遍做法,且寺庙与公产系统紧密结合,成为地方公产中的重要部分;清末新政后,寺产与世俗田产之间的界线渐渐模糊,寺产流转,渐与世俗产权流转无异,部分僧侣和地方团体却仍用前现代地方社会办学的框架来理解新政中的办学。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杨荣涛《文昌信仰与中华文化认同:藏羌彝走廊“紫府飞霞洞”的建构与共享研究》一文,立足于“紫府飞霞洞”遗存及《紫府飞霞洞记》碑文、地方志和道经等记载,认为“紫府飞霞洞”作为近世地方文献书写的文昌帝君栖息地,其在藏羌彝走廊产生并成为走廊内外多地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具有跨地域、跨族群传播的文化特质,对于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张俊《临邛古道与川西教会:明清时期川西天主教在邛崃山区的转移与变迁》一文,认为明清天主教从成都平原发轫,禁教时期迁移潜伏于邛崃山区,弛教后大规模进驻川西和康藏的转变历程,揭示了近代天主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轨迹,是探寻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在汉藏之间传播和活

动规律的重要线索。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何文华《旧识、新知与共同叙事：清代涉藏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一文，以清朝不同时期涉藏汉语文本中文成公主书写为研究对象，认为最初游藏主体受汉地传统“华夏与边缘”历史观的影响进行文成公主叙事，但又不断陈述藏地异域空间的耳闻目睹和藏文史籍相关知识，至清朝中后期书写者主体对文成公主“西域成圣”的藏地话语已经历猎奇、质疑到价值认同的演变，由此反映出不同时期清政府的西藏统治现实需求。

此外，西南所处的边缘地位，造就了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的复杂性。四川行政学院阳金平《仓外养仓的开端：嘉道时期四川济仓研究》一文，以四川济仓为研究对象，认为济仓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常平官仓的职能，政府亦主导了济仓的发商生息，以此凸显了国家力量在仓政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易艳丽《从黔铅京运看清代官僚体制运行与关系的复杂性——以赵亨铃〈铅差日记〉为中心考察》，认为赵亨铃运铅途中所作《铅差日记》，直观地展示出运铅官在办理铅务时与贵州上级官吏和朝廷、沿途地方官和同行运员、船户和水手等人的铅务关系网络，昭示了铅差难办的事实，也显露出清朝官僚体制中阶序等级森严、营私舞弊严重等问题以及底层民众唯利是图的特点。

三 关于近代西南地方文献与学术交往的研究

康藏地区的汉文文献是见证汉藏交流的重要文本。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会蓉《孔庆宗〈西藏概览〉的编纂及其价值》一文认为，孔庆宗编纂的《西藏概览》记录了晚清民国时期西藏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也记载了近代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宇柔、张蓝心《〈西康纪要〉及其价值》一文认为，《西康纪要》详细记录了西康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政治、风俗习惯等情况，也反映出汉藏间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推动康区发展的历史，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学术领域，近代西南亦一步步地趋近于主流学术话语，并构建起致力于西南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罗宝川《在守旧与趋新之间：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人员的群体构成、身份认同与制图观转型》一文，通过分析 180 位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构成发现这一群体并没有彻底突破以往的传统模式，认为群体构成不纯粹、身份认同不明晰、制图观念不统一是导致近代西南方志地图测绘精度普遍失准的主要原因。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贾红霞《“济道术之穷”：刘咸炘与蒙文通关于宋代学术交流三题》一文认为，同为四川史家的刘咸炘与蒙文通志同道合，以宋代学术为核心，溯源竞委，开启中唐—北宋连续说、南宋浙东史学及其与蜀学关系等重要话题，多发前人之覆，在点评近代学风时，又紧扣宋学流弊，回到以浙东史学补偏救弊的路径上来，足见二人的学术讨论始终围绕着如何挖掘传统资源以改造社会现实这一主题。除了学界关注较多的西南联大边疆民族研究共同体外，在四川成都的华西坝也出现了华西边疆研究共同体。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钟荣帆《抗战时期华西边疆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一文，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成都学者围绕西南边疆民族的研究与教学，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推动中国边疆学会、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与运行等历史活动，指出抗战时期成都形成了一个华西边疆研究的共同体。

四 关于近代川康民族政治与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长征时期，西南是中共接触边疆民族、思考与践行其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场域。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马廷中《民国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入党途径研究》一文指出，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入党的途径有二：一是随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民族地区的建立和发展，该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优秀分子加入地下党；二是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民族地区时大量少数民族群众加入红军，其中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体现出四川少数民族共产党员群体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邢曙光《国族建构的模式转换——对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边区民族政策的再审视》一文认为，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边区实施“联合建国—民族自治”模式，将“民族自决”与“联合建国”相统一，并将“民族自决”实际转变为“民族自治”，体现了中共对国族建构的有益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刘超、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治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四川民族地区爱国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一文，重新审视了四川民族地区爱国土司的国家认同与实践，认为这在当时对民族地区社会稳

定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也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经验。

此外,还有学者从军事与卫生角度探讨西南独特的历史面向。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鹤《试析 1937 年曾言枢率军进驻理化的原因》一文,从交通、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方面阐述了 1937 年曾言枢率军进驻理化的原因。绵阳师范学院四川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聂春燕《抗战时期四川基层卫生事业建设研究》一文,则讨论了战时四川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以及战争对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影响。

五 关于当代西南边疆民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

当代西南边疆的治理,离不开党的思想和理论的重要指导。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杨荣涛《对新中国安全观及边疆治理的脉络初识》一文,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全局提出的国家安全观和随之构建起来的安全体系,具有前后顺成的脉络关系,并对应着国家安全的大任务和边疆治理的大目标。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扎西、曲姿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来源、深刻内涵及重大意义》一文,是立足现实,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内涵、重大意义进行梳理,从而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西藏地区的引领作用。

藏羌彝走廊的人员流动与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藏羌彝走廊少数民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河南大学民族研究所王广瑞《藏彝走廊南部的族群迁徙与财富分配机制》一文认为,藏彝走廊南部的族群处于不断的迁徙与流动中,每次迁徙都伴随着财富的流动,这当中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形象的转型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都是流动性增加的促进因素。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孙红林《互为基础设施:川藏铁路建设与新时代边疆民族工作高质量融合发展探究》一文,认为川藏铁路建设给新时代边疆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而新时代边疆民族工作的创新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川藏铁路的高质量发展,二者互为基础设施。因此,新时代边疆民族工作,应从知识生产、机制创新、空间实践和认同建构等方面着手,统筹推进川藏铁路等物质基础设施与民族工作等文化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建设与融合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民居、舞蹈、艺术展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西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丁玎《传统嘉绒藏居的被动性能及使用功能演进研究》一文,通过运用田野调研、文献梳理、计算机模拟等方法,指出传统嘉绒藏居建筑的被动性能具有自上而下的适应性,且建筑材料发生改变,同时使用功能由旧转新,使用空间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与防卫功能、卫生条件及旅游产业相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罗木散《“快乐的诺苏”:当代凉山彝族集体舞蹈再造及社会意义》一文,探讨了近代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凉山彝族集体舞蹈再造的过程,从而凸显出当代凉山彝族集体舞蹈的社会意义。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程思《基于传统手工艺西南银花丝技艺调查研究》一文,基于田野调查、文献研究和比较分析,系统梳理和客观分析了中国西南区域汉、藏、苗、白等民族银器技艺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总之,此次研讨会充分展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与路径。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汪洪亮在闭幕式上表示,此次学术研讨会处处体现了“文本与田野的研究视角与范式”,让我们思考文本从何处来、田野往何处去以及文本与田野的补充、印证、互动等相关问题,文本与田野也是我们认识中国、认识区域文化、认识边疆必不可少的两种路径,围绕西南进行的文本与田野、历史与社会的研讨,也体现了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视野,未来需要形成一种跨越式、互惠式的西南研究共同体。本次研讨会聚焦中国西南历史与社会,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在地化的本土视角,对推动中国西南区域研究范式转变、研究方法突破以及研究内容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凌兴珍]